



新學

近代史上的西南军阀

江上菁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陕西出版集团



新学

近代史上的西南军阀

江上菁 /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近代史上的西南军阀 / 江上苇著.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13 (可以触摸的民国)

ISBN 978-7-224-10479-0

I. ①近… II. ①江… III. ①军阀—生平事迹—中国—民国
IV. ①K8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02909 号

近代史上的西南军阀

作 者 江上苇
出 版 陕西出版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 147 号 邮编: 710003)
发 行 北京时代联合图书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兴鹏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6 开 24 印张 336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3 月第 2 版 2013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4-10479-0
定 价 39.00 元

当理想遭逢现实

——为江上苇《迷惘的诸侯》序

今天的人提到军阀，想到的往往是封建、保守、落后、割据、蛮横，是裙带作风、妻妾成群和不谙天下大势。如果说，传承“高贵”、问鼎中原的北洋军阀，因其所处的位置，还能多少得到一些客观、公正的评价，那么僻处一隅的西南军阀，则只给人留下护国战争、顺泸起义、出川抗战、五华兵变和西康—昆明起义等一堆突兀的碎片，和几十年你不死我也不活、没完没了的混战。

谁会想到这群如泥潭里厮咬野猪般的武夫，竟几乎清一色的“科班出身”？蔡锷、唐继尧留日士官生出身，龙云、卢汉等滇系将领多出于号称“西南军事圣殿”的云南讲武堂。川军将领中，熊克武、刘存厚是留日系，刘湘、潘文华、杨森、唐世遵是速成系，刘文辉、田颂尧是保定系。黔军总司令王文华则是投笔从戎的师范研究生、历史爱好者。

如果以出身论人生，他们绝不该沉沦于割据、混战的泥潭，而应投身时代，有理想、有作为。事实上，这些后来的军阀在其入世之初，的确充满着理想主义、乃至浪漫主义的朝气：蔡锷与梁启超等大学者往还，鼓吹“军国民主义”，主张提高全民族素质；熊克武、王文华、杨森、田颂尧等参加同盟会，为推翻帝制前仆后继；王文华倡办“少年贵州会”，主张革绝暮气，重振黔风……

他们不仅这样想过，也的确曾这样尝试过。地处偏僻的云南曾以“新学”著称，有完善的新式军校教育、自给自足的现代兵工厂，和令人耳目一新的市政建设；四川刘文辉等的辖区，新式学校如雨后春

笋般出现，学校往往修得比县衙更气派；“地无三尺平”的贵州，出现了近代工业、近代体育和五花八门的学会。曾有那么几个节点，西南被视作黑暗中的一盏希望灯火：重九枪声，护国呐喊，乃至后来改变中国颜色的国民政府北伐，西南都扮演过倡先声者的角色。

然而这些意气风发、志向高远的士官生、军校生一旦手握兵权、开府控地，很快便泯然乎一众军阀，甚至比一众军阀更不堪。曾经的同盟会员田颂尧、杨森当初高喊民主、共和，提倡新风气、新气象，最后却变成画地为牢、金屋藏娇的山大王、土皇帝。书生出身的刘湘、举人出身的刘存厚曾崇尚气节，当政后却向背不定，朝秦暮楚，刘存厚还落下个“刘厚脸”的恶名。至于号称“开风气之先”的云南，从唐继尧到龙云等四军长，再到卢汉等四师长，初起事时无不高喊为国为民、革除弊政，一旦当权，却仍然回到以裙带治政、治军的军阀老路上去。打着为国为民、出身多半清白的西南军阀，收起苛捐杂税来，却往往比“生下来就是军阀”的北洋系更狠。

事实上，这种蜕变非惟西南，在全国范围内都普遍存在，如积极投身二次革命、曾倡导“湖南自治”的赵恒惕，在新疆推行新政的杨增新，甚至被讥讽为“经典军阀”的阎锡山，都曾从言论、乃至行动上，走在时代的前面，但久而久之，他们便同样泯乎众人，甚至比那些“野出身”的军阀更加不堪。

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是从丛林法则横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之经典模型——理想、道德、志向，都不得不让位于生存自保。四川军阀们尝过罗佩金主川“大云南主义”的恶果，云南军阀们也看过蔡锷让权、唐继尧恋栈的正反例子，而理想主义色彩最浓厚的王文华，最终却落得凄凉下场。纷至沓来的前车之鉴让善于学习的西南诸侯们猛省：理想可以谈，也可以做，但若保不住地盘，一切都是虚话。

当现实过于强大时，理想是脆弱的，个人更是无力抵抗命运的捉弄。远离政治中心和矛盾焦点的西南诸侯在这种日复一日、没完没了的自保和困人中，逐渐销磨了昔日的敏锐与志向，变得患得患失、斤斤计较、目光短浅、得过且过，为保住地盘和实力无所不用其极。他们中虽有个别人终究重归于理想主义，但这也只不过是“大权旁落且复

兴无望、无可奈何下的角色回归。哪怕还有一线重返泥潭的希望，他们仍宁可变回昨日之山大王，也决不愿重做前日之士大夫——唐继尧、杨森，都是典型的例子。

任何一个时代的命运，都是由无数个人命运汇流而成，研究西南军阀们从理想到现实的步步滑落，有助于今天的人们去体味历史的无情、前人的无奈，去认真思考自己在理想与现实间的定位。

我与本书作者江上苇认识已近十年，当年的他，意气风发，是个天不怕地不怕，说好听点儿充满朝气，说不好听点儿就是“不知天高地厚”的少年人。岁月磨砺，如今他已在近现代军事史研究领域开辟了一方天地。

然而写书和做研究是两码事。正如理想和现实往往充满了痛苦的冲突与矛盾一般，唐继尧、刘文辉们当年徘徊于理想与现实间的痛苦，作者和我也同样时刻需要去思索、去面对。生活的压力，生命的尊严，理想的崇高，现实的无情，林林总总，交织缠扰。当月黑灯高，笔下西南诸侯们你方唱罢我登场之际，看看书稿，再看看自己，是否会自嘲地发出一声苦笑？

当理想遭逢现实时，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答案。当所有答案交织在一起时，便是今日之现实、明日之历史。古今中外，大抵如此。

陶短房

庚寅二月十六 北美列治文市

- 第一章 秀才、袍哥、辛亥年 / 1
 - 一、杀死帝国的人 / 2
 - 二、乱党轶事 / 10
 - 三、独立 / 17
- 第二章 乱世的捣蛋鬼：士官生 / 24
 - 一、英雄行状 / 25
 - 二、好时代，坏时代 / 30
 - 三、川藏边界危机 / 34
 - 四、划过乱世的流星 / 40
- 第三章 英雄乘时务割据 / 45
 - 一、滇军崛起 / 46
 - 二、莫道春秋无义战 / 55
- 第四章 天下未乱蜀先乱 / 67
 - 一、王旗幻变 / 68
 - 二、川滇之战 / 75
 - 三、川黔之战 / 85
- 第五章 国民党版“取西川” / 95
 - 一、北洋插足 / 96
 - 二、东斌系家世 / 102
 - 三、翻云覆雨 / 111
- 第六章 倒熊之役 / 119
 - 一、倒下的泰坦 / 120

- 二、剪不断，理还乱 / 127
- 三、风云人物的青葱岁月之一：士官十一期那几位兄台 / 139
- 四、风云人物的青葱岁月之二：杨大帅的倒戈生涯 / 144
- 五、风云人物的青葱岁月之三：小警察的军官梦 / 161
- 第七章 反噬的时代 / 171
 - 一、贵州：一自英雄起逐鹿 / 171
 - 二、云南：天下兴亡缘底事 / 192
- 第八章 西蜀事业是偏安 / 214
 - 一、南北两督之争 / 215
 - 二、东征记 / 219
 - 三、一、二军交恶 / 230
 - 四、从逍遥津到麦城：刘瞎子的英雄时代 / 237
 - 五、黔军：乱世的搅局者 / 248
 - 六、东斌系的末日：虎门大狱 / 258
- 第九章 割据时代的“统一”梦 / 265
 - 一、杨森的“新政” / 266
 - 二、“统一”之战 / 270
 - 三、哈儿师长范绍增 / 281
 - 四、驱黔之战 / 288
- 第十章 北伐，诸侯的噩梦 / 293
 - 一、雄藩的丧钟 / 293
 - 二、万县的炮声 / 304
 - 三、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 / 311
 - 四、北伐与东征 / 326
 - 五、玉帅入川风波 / 331
- 第十一章 最后的盛宴 / 338
 - 一、二刘霸局 / 339
 - 二、下一个众矢之的：刘文辉 / 349
 - 三、省门之战 / 356
 - 四、从泸州到老君台 / 361
 - 五、走西康 / 370

第一章 秀才、袍哥、辛亥年

公元1911年10月9日，也就是农历辛亥年的八月十八日深夜，大清国湖广总督治下的武昌府地方，有一群乱党分子在小朝街85号密谋造反。

孰料事机不密——说来惭愧，这帮乱党分子历来是慷慨激昂有余、小心谨慎不足的，所以出这种事儿一点都不稀奇——于是就被闻讯赶来的捕快人等逮了个正着。

既然人赃俱获，不消说，谋反大罪自然是要杀头的。

彭楚藩、刘复基、杨宏胜三位被草草审讯后，便于次日凌晨给斩掉了，终究没能看见即将到来的曙光——这时已经到了农历的八月十九日，西历的10月10日，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具翻天覆地意义的一天。

一同被衙门捕获的，还有一位两湖师范学校的高年级学生牟鸿勋，作为谋反大逆的同谋，照理也是要剃掉脑袋的。不过当天该老兄运气实在不坏，过堂的时候堂上居然还有位熟人在陪审。这位以知府资格陪审的先生，正是同时身兼两湖师范学校总务长的陈树屏。

这老陈和小牟两人，正是师生关系。

这样一来，事情就有了转机。

陈大人一听这牟鸿勋自报是师范学生，顿时便来了精神，抓住机会就和主审官铁忠大人打哈哈：这天下哪里有秀才造反的事！铁大人您听说过吗？没听说过吧？我也没听说过，一定是咱们抓错人了嘛……咳，咳，小伙子，你平时都读些什么书啊？《古文观止》？（小牟摇头）《纲鉴

易知录》？（小牟继续摇头）《圣谕广训》一定是常读的了？（小牟使劲摇头）噢，那你都读些什么？（这回改老陈拼命撇嘴皱眉眨眼睛）

小牟大义凛然地答道：“我读的就是《猛回头》《警世钟》《革命军》。”

一水儿的乱党谋反宣传材料！

话问到这分上，主审铁忠大人还能有什么好说的？来人哪，将这厮推出去，和那三个乱党分子一块儿斩了！

陈大人心疼，说这么好的小伙子可惜啊……他，他，他一定是有精神病，难保不是咱们给吓的——满口胡诌，算不得数，算不得数！

胡扯到最后，铁忠大人无奈，说陈兄您爱护学生的心情咱可以体谅，但如此明显的谋反大逆，咱们总不能轻轻就放过吧？不然朝廷那里，多少有些不方便呢……

陈大人便要无赖，说实在要杀也不能今晚就杀，请你无论如何放到明天再说！

铁忠却不过同僚情面，答应了。

结果呢？当天晚上武昌首义的枪声就响了，朝廷大员们死的死，逃的逃，牟鸿勋自然不用再死。于是这首义“四烈士”也就变成了“三烈士”。

唉，那时候的大清朝，对这帮念新学的秀才是多么的纵容和爱护啊！可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一、杀死帝国的人

自从1840年，被来自大不列颠的洋鬼子用枪炮砸开了大门之后，中华帝国的统治者便开始懵懵懂懂地意识到：咱们那些从老祖宗那里传下来的旧知识，已经不大够用了！

于是他们拼命地兴洋务，办新学。

而在甲午、庚子之后，屡败于洋人奇技淫巧之下的大清朝更是不惜血本，加倍努力地推行新学的建设——他们以为ABC加上数理化就能化解这个古老帝国眼前的危机。

可这个被列强瓜分的刺刀逼急了了的朝廷，却忘记了去思考一个简单的问题：为什么他们手里那些古老的传统政治课本，总是在孜孜不倦地

教导他们要“愚民”，大讲什么“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道理呢？道理说来也很简单。

这个古老的大一统帝国，在过去漫长的岁月中，一直在使用一种自诞生起便已存在的理念来组织和运作整个国家。大一统的基础，是思想的统一——旧时代的皇帝们很现实，他们很清楚自己的时代局限性，也知道自己没办法让所有的子民什么都明白，于是便选择了让他们什么都不明白——这也是一种思想的统一，虽然只是一种低水平的统一。

然而当时技术水平的局限，和对大一统的渴求，使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们，也只能在这样无可奈何的妥协中达成思想的统一。

于是帝国的统治者，便把这条愚民术当成了求稳定的不二法门世代相传，小心翼翼地不让自己的子民去沾染一切与“新”字沾边儿的东西——因为小民们一旦具有新思想，便会理所当然地质疑旧体制的合理性，甚至还会运用新思想所赋予的强大力量去为他们脑子里的胡思乱想争夺统治地位。

照这样发展下去，这些原本老实怯懦的小老百姓，就会变成大义凛然的乱党，而这对于旧帝国，将意味着颠覆——就如冶铁牛耕推翻了宗周体制，公羊学说推翻了西汉帝国，火药和航海术推翻了中世纪的欧洲王权一样。

可是20世纪初的大清朝，被洋鬼子逼急了，对这一切无暇多想。它稀里糊涂地以为自己的贫弱只不过是因为技不如人，于是便慌慌张张地废掉了古老的科举，大举新学，还向欧美日本派出大批留学生，去学习它昨天还很瞧不上眼的那些“奇技淫巧”——它就这样在匆忙间，傻乎乎地走上了那条于它自身利益其实是顶不利的求新道路。

凡有大利于后世者，多不利于当时，隋炀帝开运河是这样，大清朝办新学也是这样。

我们当然可以嘲笑这个可悲的王朝，不过我们最好在嘲笑之前，先回忆一下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以及在那个朝不保夕的征服时代里究竟有多少闲暇工夫能留给人们去坐而论道。

当我们今天像洋鬼子一样端着咖啡，在高堂广厦间侃侃而谈，反思或是嘲笑那些可怜可悲甚至是可笑的前辈时，请不要忘记了我们所身处的，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时代：在我们的脑门上没有刺刀逼着，而他们有；

我们可以在图书馆里互联网上了解整个地球上古往今来的生灵百态，而他们呢？他们眼前是一团漆黑，只知道子曰诗云，能把人类文明史上最灿烂的火花当成是萤火虫，能疑心火轮船是牛拉的，还能把鸦片烟当成福寿膏……

这种区别，是一条深深的鸿沟。

就这样，朝廷的期望和事实出现了偏差，当那些被寄予厚望的留学生们归来的时候，它顿时就傻眼了。旧时代的体制，果然容不下新时代的思想，而新时代的思想也同样瞧不惯旧时代的体制。新思想越是发展得快，它和旧时代的冲突就来得越猛烈。

于是乎，最早起来质疑朝廷合理性的，反倒正是那些朝廷掏钱培养出来、接受了各种新潮思想的读书人。可是这些自命不凡的洋秀才们，除了脖子上的脑袋、腔子里的热血和一肚子的不合时宜之外，其实并不具备改朝换代的能耐——至少在初起时，确乎是这样的，不然怎么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呢？

可是偏偏就有人肯支持他们，这就是那些抱着两百多年前的古老仇恨和颠覆任务的会党组织。

会党组织当然乐于和秀才们联手推翻这个征服王朝。事实上，他们打骨子里就是为了这个任务而存在的。

17世纪中叶，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个汉人帝国——大明王朝，被来自东北的满洲人所灭亡。那些不甘亡国的大明遗民在一番无望的苦战之后，终于旗折矢尽。

幸存者星散四落，或隐身于江湖林莽，或逃遁于海外孤岛。虽然他们已经无力公然对抗那个正在步入鼎盛时期的征服王朝，但他们从来没有放弃过恢复故国的理想。

这些在江湖中漂泊的志士们，生活在征服者的高压统治下，只得暗地里通过结义形式组织会党力量，以忠义复国思想相号召。他们所创建的这些会党组织开枝散叶，遂在民间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反抗暗流，尤其是在朝廷统治力量相对薄弱的南方。

在西南各省，这种会党组织被称作“哥老会”，也就是所谓“袍哥”组织。“袍哥”这个称谓的来由有两说，一说是源于《三国演义》中关羽人在曹营心在汉，总把兄长刘备所赠的袍子穿在外面的典故。另一说

则是源自明朝遗民顾炎武，传说他搞民间秘密组织，取义于《诗经·无衣》中“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的含义，称之为“袍哥”。无论这两说以哪一说为是，袍哥组织初起时的宗旨是反清复明，并以忠义自诩，却是毋庸置疑的。

那些无名的志士组织这些反清秘密组织时，曾经抱着相当的期望，但他们却终究没能等到那一天——因为这场等待实在过于漫长了。一直到两百多年后，他们当年所落下的这枚棋子，才会发挥作用，而这已远远超出了人类的寿数。

这又一次印证了那个事实：任何历史存在都将对未来产生影响，但那到底会在什么时候，我们却永远猜不到。

那些会党组织成立的初衷是无可非议的，然而漫长的时间，足以让最初那些纯洁、高尚而无私的理想，蒙上许多世俗的尘埃。

于是，当它最终迸发出光芒的时候，我们并没有看到浴火重生的凤凰，却看见了一只浑身都是矛盾的四不像——尤其是当它以古老的仇恨为号召、以现世利益为基础组织起来的民间力量，和未经验证的新思想突兀地、急功近利地结合起来的时候。

新思想来得太突兀又太性急，在还没有培养起自己的力量之前，便跃跃欲试想大干一场。可这个新生儿又实在是太虚弱了，于是只好去找另一个与它有着暂时的共同语言的旧时代叛徒搭伙，它们就这样合伙推翻了它们彼此都看不顺眼的那个可恶而又倒霉的王朝。

可这又有什么问题呢？

新思想为了纯洁高尚的目的（至少它自己是这么认为的），便把一切都豁了出去——它甚至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找来一群黑帮分子同谋造反。

可是，这个死脑筋的同谋可不懂得什么立宪共和！它只知道“反清复明”，并按照中世纪的理念替天行道而已，根本就没兴趣进入一个循规蹈矩的新时代！

于是新思想所无限憧憬的美好未来，便因这个满身邪气的股东的加入，而改变了模样。而我们也只好苦笑着承认，那是个急功近利而又总是信心爆棚的年代，所以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们，大多也都有点二百五。

单从这个角度上讲，这场革命就注定是一场充满矛盾的革命，也注

定是一场不彻底的革命：它仅仅改变了旧时代的帝王体制（就这，还是推翻异族统治过程中的副产品），并没能改变旧时代那些根深蒂固的帝王思想以及滋生这一切的土壤。

这也就注定了，还需要一场更彻底、更激烈、更天翻地覆的革命来为它擦屁股。

说了许多闲话，但这，就是那个充满了矛盾的辛亥年的背景。

我们知道，辛亥年的第一声枪响，迸发于武昌，然而其导火索却要遥远得多，那就是川汉铁路的主权之争。

川汉铁路源起于1903年四川总督锡良的建议。

那是一个国内各省都准备大建铁路，以便从洋鬼子手里争权利保主权的时代。

锡良总督也怀着这样一个良好的愿望，打算在四川与湖北之间自建铁路。其动机是“所谓自办者，即不招外股，不借外债之谓也”，其目的则是“以辟利源而保主权”。锡良打算修建从成都起，经内江、重庆、万县、奉节、秭归、宜昌，至汉口的铁路，全长预计三千里，初步预算耗资将达白银五千万两之多。

这在当时，是一笔惊人的巨款，单靠政府显然是难以筹措的。

于是锡良总督不得不另打主意——他的办法就是，发动群众，分股募资。在他的推动下，1904年官督商办的川汉铁路总公司成立，并以政府信用为担保，面向国内各界筹资。

川汉铁路建设资金的筹集，主要依靠两条途径。

一方面，朝廷投入部分启动资金，并作为国有资产参股。

另一方面，则为民间筹资：官绅商民自愿认购一部分股票；然后公司用已筹得的资金办实业牟利，以获得的利润参股；但最大的一部分，则靠在四川以租谷附征和征取货物厘金的方式筹集。这是一种带强制性的集资方式，全川无论是佃农、自耕农还是小债主，凡岁入十石以上的，均须按百分之三抽取租股——以1911年的清算结果来看，总共募集的资金近一千二百万两白银，其中租股竟占了四分之三以上。

由此一来，当时全川七千万人民，大都与川汉铁路建立了最直接的、同时也是最现实的利益关系。所以当最后几个并无力量的举人秀才振臂一呼时，居然全川响动，天下崩溃，锡良总督是“功”不可没的。

在这里，命运和一心想干点实事的锡良总督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这个以巩固帝国统治为初衷的提议，最终却导致了帝国的崩溃。

这是因为，到1911年5月9日，天下形势忽然发生了变化。

清政府在洋鬼子的强大压力下，罔顾各省已将铁路股权出售给国民的事实，贸然颁布“铁路干线国有政策”，打算夺取川汉等铁路干线的主权，改而出售给洋人。

朝廷这种出尔反尔的行为，立刻激怒了全川的臣民，尤其让四川人生气的是，朝廷居然还大搞地域歧视，虽然一度允还铁路股本，但“优于湘粤，独薄于四川”。湖南在朝中广有人脉，广东则是全国的财税大省，朝廷不能不略作让步。四川人什么都不占，要不想当这个冤大头，便只好靠闹腾了。

正所谓君不君，则臣不臣。

于是6月17日，以进士蒲殿俊、举人罗纶、秀才张澜等为首的“四川保路同志会”，在成都成立。

蒲进士等人的打算，原亦不过保利权，争主权，把洋鬼子挡在川外，把旧银子收回袋中而已。但最后事态的发展，却远远超出了他们的预期——这些秀才举人进士们大概也没有想到，他们的一个不小心，竟然推翻了整个王朝。

就这样，蝴蝶的翅膀轻轻划动空气，却酝酿起一场足以摧毁旧帝国的飓风。

当时代理四川总督的，是原布政使王人文。王大人了解基层情况，故而很好说话。他答应向朝廷申诉，但旋即两遭严旨斥责，最后还被撤职。

接下来继任川督的，便是刚平了川边回来的赵尔丰。赵尔丰素来



蒲殿俊，字伯英，四川广安人，光绪年间进士，后留日。清末任四川咨议局议长，为保路运动领袖人物之一。

以手腕严酷著称，早在四川建昌道任上便有“赵屠户”之名，朝廷以他接替温和的王人文，显然是要用强硬手段镇压保路运动了。

于是全川大哗，一场平民和朝廷的对抗就这样开始了。

但即便是以强硬著称的赵大人，面对当时的形势也不能不再三掂量，他也希望能够以双方都满意的方式解决问题。

但赵大人不糊涂，不能代表朝廷也不糊涂，紫禁城里那些高高在上的糊涂权贵们，不可饶恕地误读了天下大势。他们满以为只要赵尔丰再强硬一点，平民们就会老实起来；如果还不肯老实，就用刀子剥掉那些不老实的脑袋好了——他们还在拿着两三百年前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世界呢！

然而，这已经不是一两道行政命令就可以随意宰割天下的时代了！

中世纪的黑暗正在退去，钢铁、煤炭与火药技术正在埋葬最后的骁骑兵，同时也在埋葬着最后的君王暴政。可那些在大刀迷信和暴政传统中成长起来的清廷权贵们，还远没有意识到这一点——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说过：“君王必须是一头能认识陷阱的狐狸，同时又必须是一头能使豺狼惊骇的狮子。”甲午战争、庚子拳变的相继挫败，已经剥掉了紫禁城那张久已不合身的狮子皮；可它仍不知悔改，这回在执行“铁路干线国有政策”中的愚蠢表现，更是让它连狐狸都当不成了。

骑射时代的辉煌早已结束，可骑射手的后代们却还在妄想着用那个时代的方式来统治巨变中的帝国！

恼羞成怒的紫禁城，遂一再切责赵尔丰的软弱无能，并打算以端方代替他处理川事。事态就这样一步步激化，使一个腐朽的老帝国崩溃的多米诺骨牌开始一块块倒下。

9月7日，被朝廷一再谴责为软弱的赵大人终于强硬起来，他决定干出点政绩给朝廷看看。

他诱捕了蒲殿俊等保路同志会头目七人，并准备处决。于是平民们便群集督抚衙门前请愿示威，赵大人毫不妥协（他还有退路吗？），断然下令开枪，当场死伤多人——说句闲话，被打死打伤的人中，大都是手持香炉、头顶着德宗光绪皇帝牌位的和平请愿者。

对皇帝的幻想破灭了，和平商榷的希望也破灭了，平民们被彻底激怒了，他们立刻变成了乱党。接下来旬日间，成都周边各路袍哥纷纷组

织保路同志军，集结二十万人包围省城示威。

后来在北伐时代死守武昌城不投降的直系猛将刘玉春，这会儿就在新繁、金堂一带忙着剿“匪”，打的尽是些四十个兵对付五千，或是两个连对付三万四川乱民的仗……

朝廷闻警，立刻催调大员端方署理四川总督，并率湖广新军一协入川以资镇抚，同时还起用曾任川督的岑春煊入川会同办理剿抚事宜。

然而古老帝国的大限已到，这一切都将是徒劳。

紧接着，下一块多米诺骨牌，也是最要命的那块，便倒下了。

1911年10月10日，武昌新军趁着端方大人出征的机会，发动首义，朝着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打响了决定性的第一枪。不管在整个过程中有多少形同儿戏的故事可以让我们在此后的岁月里闲嗑牙，但这场革命的历史意义终究是不容置疑的。

到这个时候，色厉内荏的朝廷终于撑不住了，它忽然变得温和起来。端方大人在四川颁布安民告示，答应释放被捕人等，并允诺撤查赵尔丰等人。但此时老百姓们所要的，已经不再是这些个了。

有乱党分子在端方大人颁布的安民告示上，每句添了两个字，表明了矛盾的不可调和性：

蒲罗九人释放（未必）

田周王饶参办（应该）

尔等迫切请求（何尝）

天恩果如尔愿（放屁）

良民各自归家（做梦）

匪徒从速解散（不能）

倘有持械抗拒（一定）

官兵痛剿莫怨（请来）

这不由得让人想起了房龙笔下的法国大革命：“当人们吵嚷着要得到‘A’时，国王指责他们，什么也不给。接着王宫被一群叫嚷的穷人包围，国王屈服了，答应给子民他们想要的东西。但到此时，人们要的已经是‘A+B’了。当国王在谕旨上签字，给他亲爱的子民‘A’和‘B’时，他们要求得到的，则是‘A+B+C’了，否则他们就要清洗整